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或地区政治风险分析

研发部 余潜

摘要：自 2013 年 9 月和 10 月中国最高领导人分别提出建设“新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合作倡议以来，“一带一路”建设稳步推进。但由于“一带一路”合作倡议所涉及的国家众多、民族繁杂，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过程中，不可避免的会涉及到沿线国家和地区的政治风险问题，且根据现有的实践情况来看，政治风险越来越成为影响“一带一路”倡议建设的主要风险点。据此，本文将立足于现有的政治风险理论基础，并结合“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实际状况，深入分析各区域的主要政治风险表现形式，以供相关投资者进行决策参考。

一、政治风险的界定

关于政治风险的定义，目前学术界尚无一个明确或统一的标准，参考 2013 年陆雄文教授编撰并由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发行的《管理学大辞典》中相关内容，我们可以将政治风险定义为因种族，宗教，利益集团和国家之间的冲突，或因政策，制度的变革与权利的交替造成损失的风险。政治风险主要包括政策变化、政局变动、外部势力干扰，以及由经济利益、领土争端、宗教矛盾或民族冲突等问题而引发的国家内部或者国家之间的冲突与较量。若按照地理区域范围进行划分，政治风险可以主要分为国家政治风险和国际政治风险两个方面。

（一）国家政治风险

国家政治风险主要是指一国之内的政策突变、政局动荡、反对势力等因素对实现战略目标的过程所造成的不确定性威胁乃至阻碍。

第一，国家政策变动风险。当沿线国家和地区的政策和制度发生的变化与“一带一路”倡议的目标和规划相违背的时候，可能会在局部甚至整体上对“一带一路”倡议产生负面影响。依据国家政策作用的范围，我们可以将其划分为对外政策和对内政策。对外政策主要是指该国的外交政策和基本战略，具体表现为该国在国际交往与斗争过程中所追求的目标与价值取向，以及对其他国家或国际组织相关政治行为的回应方式、原则和策略。非理性的外交政策可能会导致国家之间的关系恶化，从而形成政治风险。对内政策主要包括经济政策、宗教政策、民族政策等。以经济政策为例，国家或地区的税收政策、货币政策、市场制度等会直接影响到该国或地区的政治经济稳定性，进而影响到外来投资者的投资决策。譬如，2018 年 3 月，美国依据“301 调查”的结果，计划对部分中国产的出口至美

国的商品征收巨额关税，这将严重影响中美之间乃至全球贸易的健康良性发展。

第二，政局动荡风险。政局动荡风险普遍存在于“一带一路”沿线各个国家和地区。首先，某些沿线国家政治体系不够成熟，政治制度尚不完善，加之国内存在着阶级、派别、种族、宗教、移民等各方面的深层次矛盾，极有可能导致国内各种政治运动频发，包括政权合法性危机、分裂独立危机甚至宗教战争等。其次，国内政治斗争、政权更迭和政治转型等问题可能使得未来政府的政策倾向甚至国家体制都难以确定，这样造成的风险具有颠覆性和长期性，使国家间的合作充满变数。例如：普什图族是阿富汗最大的民族，历来敌视少数民族政治势力。阿富汗的塔利班政权中大部分都是普什图人，且强烈反对什叶派，长期扮演煽动宗教、民族与国家分裂的角色，致使阿富汗长期处于动荡的政治局面当中，严重影响了外来投资者的进入和国家的稳定发展。

第三，反华势力干扰。鉴于中国日益强大的国际影响力，“一带一路”沿线部分国家和地区的反华势力开始蠢蠢欲动，反华事件也屡有发生，这严重影响了中国在当地的投资与发展。还有些国家的个别领导人试图以排华的方式来谋求个人的政治利益，如争取选票、减轻执政压力等。例如：2017年6月蒙古大选期间，有参选人不断以“中国威胁论”为借口来攻击竞选对手，捞取选票，抬升民望，意图将经济衰退的责任归结到中国的身上，以转移民众对政府发展经济不力的不满。

（二）国际政治风险

国际政治风险主要指国家或国际组织之间因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分歧而诱发国际局势动荡的政治因素，主要包括：双边或多边的国际冲突，域外大国的干扰以及联盟或势力范围内的矛盾与危机。

第一，国际冲突，这类冲突可以分为根本性冲突和非根本性冲突。根本性冲突主要包括领土主权争端等。例如：中国与越南、菲律宾等邻国之间长期存在的岛屿争端问题，这原本只是双边问题，但近年来这一问题的国际化趋势愈演愈烈，非常不利于“一带一路”倡议的顺利推进。非根本性冲突则主要包括制度的冲突、文化的冲突、宗教的冲突、国际恐怖组织的威胁与侵犯等。例如：散落在中东和北非各地的恐怖主义组织相互勾结，不断使用暴力恐怖袭击威胁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与稳定。

第二，大国干扰风险。“一带一路”倡议规模宏大，涉及的地理区域和产业范围都极为广泛，不可避免的会触及到一些域外大国的既得政治和经济利益，从而导致这些大国对“一带一路”倡议心存芥蒂甚至不满。例如：美国的某些政客和媒体借助劳工标准和环境保护等问题，企图破坏“一带一路”倡议在国际舞台

上的声誉,甚至谣传中国图谋通过“一带一路”倡议来控制亚欧大陆和独霸世界。

第三,联盟或势力范围内的危机。“一带一路”倡议的持续推进需要沿线各国和地区之间的通力协作,共创良好的发展环境;但某些政治或经济联盟内部出现裂痕甚至爆发冲突将导致相关政治风险凸显。例如:希腊债务危机与难民潮问题给欧盟内部带来巨大的经济负担和道德危机,德国总理默克尔的按比例公平分担接待难民的提议被某些欧盟成员国否定,欧盟内部在一系列政治、经济和社会问题上出现裂痕,导致部分国家脱欧主义势力抬头甚至已经脱欧,这在一定程度上给“一带一路”倡议在欧洲地区的推进带来了不确定性因素。

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政治风险概况

由于现有的国际三大信用评级机构及国内主要信用评级机构在进行主权信用评级时都未将政治风险进行定量分析,故无法对各国家和地区的政治风险进行细分和具体排名。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我们可以参考政治风险评估公司 PRS (The Political Risk Services) 集团每年定期发布的 ICRG (international country risk guide) 报告。PRS 是全球政治风险评估最具影响力的机构之一,其每年发布的 ICRG 报告监测了全球 140 多个国家的政治风险数据,被 IMF, 世界银行等众多国际组织广泛引用,具有较高的权威性。2016 年 PRS 集团发布的 ICRG 报告当中,涵盖了 47 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政治风险的数据,虽未能全面覆盖“一带一路”沿线的 65 个国家,但也基本上能够反映出整个“一带一路”沿线及其下属各区域的政治风险概况。

ICRG 中的政治风险指标包含了政府稳定性、社会经济条件、与投资相关的条件、内部矛盾、外部矛盾、腐败、军队的政治影响力、宗教的政治影响力、法律法规和秩序、种族关系紧张程度、民主问责制和行政能力等 12 项。每项都有固定的分值,总分为 100 分。PRS 集团根据各个国家的实际政治风险状况对其进行打分评估,分值越高则表示该国政治风险越低,反之亦然。其中,分值低于 50 分的被定义为极高风险国家,50-60 分的为高风险国家,60-70 分的为中等风险国家,70-80 分的为低风险国家,80 分以上的则是极低风险国家。

图表 1. 2016 年度 ICRG 报告中“一带一路”沿线部分国家的政治风险状况

极高风险	高风险	中等风险	低风险	极低风险
伊拉克 (39.63)	也门 (50.00)	越南 (60.25)	拉脱维亚 (70.08)	文莱 (80.13)
叙利亚 (41.29)	黎巴嫩 (52.79)	阿塞拜疆 (60.54)	爱沙尼亚 (71.75)	新加坡 (83.00)
埃及 (46.75)	缅甸 (53.71)	菲律宾 (62.42)	阿曼 (72.50)	
孟加拉国 (48.17)	白俄罗斯 (53.75)	约旦 (62.50)	卡塔尔 (72.50)	
巴基斯坦 (48.79)	斯里兰卡 (54.08)	乌克兰 (63.50)	匈牙利 (72.75)	
伊朗 (49.71)	印度尼西亚 (55.63)	巴林 (63.88)	马来西亚 (72.75)	
	土耳其 (55.67)	保加利亚 (65.21)	立陶宛 (73.54)	

	泰国 (57.29)	阿尔巴尼亚 (65.67)	斯洛伐克 (73.83)	
	俄罗斯 (58.04)	哈萨克斯坦 (65.92)	捷克 (74.21)	
	塞尔维亚 (58.50)	罗马尼亚 (65.92)	波兰 (74.42)	
	摩尔多瓦 (58.63)	蒙古 (66.71)		
	印度 (58.83)	科威特 (66.75)		
	亚美尼亚 (59.00)	以色列 (67.04)		
		沙特阿拉伯 (67.58)		
		克罗地亚 (69.67)		
		斯洛文尼亚 (69.79)		

资料来源：ICRG，新世纪整理

由图表 1 可知，“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政治风险整体偏高，中等及中等以上风险的国家占据了绝大多数。

三、“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政治风险分析

“一带一路”横跨亚欧非三大洲，所涉及国家达 65 个之多，中国与这些国家，以及这些国家相互之间都形成了错综复杂的政治利益关系。为了便于进一步的深入研究“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政治风险特点，我们将“一带一路”所覆盖的区域划分为六大板块，即北亚、中亚、南亚、中东和北非、东南亚和中东欧地区。针对每一个区域的政治风险作如下梳理与探究：

（一）北亚地区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中北亚地区主要包括两个国家：俄罗斯和蒙古。两国作为中国的邻国，同中国之间的经贸往来非常密切，同时也与中国保持着较为良好的政治外交关系，其中中俄之间发展出了“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准政治同盟关系，中蒙之间也被定义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这就决定了中国在北亚地区推进“一带一路”倡议的过程中面临的¹政治风险主要来源于俄蒙两国内部的政策风险而非外部的干扰风险。

1. 政局动荡和政策变动的风险较高

蒙古国实行一院制的政治制度，各政党之间存在较大的政治分歧，政府的人事变动也较为频繁，且在换届时常常出现议案重审的状况，对包括中国在内的众多国外投资活动的顺利进行增添了阻碍。俄罗斯则由于实行联邦制，苏联解体之后中央政府对各地方的控制力度大为削弱，中央和地方的权力博弈始终贯穿着二十年以来的俄罗斯政局发展的全过程，这将为日后，尤其是后普京时代俄罗斯的政局动荡埋下隐患。

同时，蒙古与俄罗斯在吸引外资的政策上都存在着长期的不确定性。蒙古曾经因为多次单方面的改变投资政策而被相关国际研究机构评为全球最差矿业开

采与开发国。俄罗斯也因较为严重的腐败行为而导致政府办公效率低下，投资政策透明度严重不足。例如，2009年俄罗斯就曾关闭位于莫斯科的切尔基佐沃大市场，并对中国商人的资产进行没收。结合类似的历史记录，从中长期来看，蒙古和俄罗斯两国的外商投资政策存在着较大的不确定性，风险较高。

2. 国内反华势力干扰的风险在一定程度上将长期存在

受历史因素影响，蒙古和俄罗斯国内民众均存在一定程度上的排华心理，大量的反华分子将作案目标对准在其国内进行经商活动的中国商人及其工厂。此外，蒙古和俄罗斯对来自中国的投资始终抱有戒备心理。蒙古政府推行“第三邻国”的外交政策，致力于不断引入第三方的域外国家来平衡中蒙关系；而俄罗斯则视中国对其远东地区的投资为潜在的威胁，俄政府内部反华势力据此不断给中国投资者设置各种障碍。

（二）中亚地区

中亚五国（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和土库曼斯坦）是亚欧大陆的地理中心，也是中国连接“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重要交通枢纽。20多年来，中亚五国同中国之间保持着良好的外交关系及经贸往来。“一带一路”倡议实施以来，中国在中亚地区的投资活动持续发展，但从长远来看，中亚五国特殊的政治体制及域外大国干预仍将是制约中国“一带一路”倡议在该地区推进的潜在政治风险。

1. 领导人问题带来的国内政局动荡的风险较高

中亚五国继承自前苏联，具有浓厚的强人政治文化，个人崇拜盛行，这对国家的政治稳定性造成一定的负面影响。具体体现在，中亚五国领导人多为长期执政者，例如哈萨克斯坦总统纳扎尔巴耶夫自1991年苏联解体后即就任总统职位，至今已超过27年；乌兹别克斯坦前总统卡西莫夫也执政超过25年直至2016年去世。未来中国在推进“一带一路”倡议的过程当中将不可避免的面临这些国家最高权力交接的问题，由于强人政治文化的存在，在权力交接的过程中可能会产生各种不确定性，譬如政策的不连续性，以及后续接班人对局面的掌控能力不足而导致的国内政局动荡的风险。较为典型的风险关注点有哈萨克斯坦总统纳扎尔巴耶夫未来有可能传位给他的女儿-具有强烈“亲西方”意识的纳扎尔巴耶娃，这一政治格局的变迁或将给“一带一路”倡议在该地区的投资活动带来巨大的不确定性。

2. 美俄等大国干扰的风险较高

中亚地区作为亚欧大陆世界岛的枢纽地带，地缘政治地位极其重要，历来都

是大国博弈的重要战场。历史上，美俄等大国都曾先后对这一地区进行战略争夺乃至直接干预。前苏联解体之后，俄罗斯在中亚地区成立了“独联体”组织，将中亚五国视为俄罗斯的后院加以控制；美国则借助反恐战争之名不断加强对中亚地区的政治渗透，甚至在该地区策划和鼓动所谓的颜色革命。譬如，土库曼斯坦在建设里海油气管道方案的抉择上就面临着美俄两国的双重战略争夺；哈萨克斯坦在维持与俄罗斯的特殊外交关系的同时，也在积极引入美国等外部大国势力；塔吉克斯坦因为地域的特殊性也深陷于俄罗斯、美国、印度等国的战略博弈之中；同样，吉尔吉斯斯坦也处在俄罗斯和美国的战略保护之下，2005年吉尔吉斯斯坦爆发的“郁金香革命”背后就存在美国等西方大国积极策动的影子，甚至直至2013年，吉尔吉斯斯坦境内仍存有美军在中亚最大的军事基地——玛纳斯空军基地。在“一带一路”倡议推进的过程中，这种来自大国的干预在未来的数年内可能会继续造成新的政治洗牌，进而严重影响投资环境的稳定性，这是中亚地区不容忽视的政治风险状况。

（三）南亚地区

南亚七国中，唯一没有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的国家是不丹。其余各国均与中国保持着较为良好、稳定的外交关系。中国在南亚地区推进“一带一路”倡议所面临的主要政治风险是各国政局不稳定所导致的政策变动风险及区域性大国的干扰风险。

1. 政局不稳定导致的政策变动风险较高

南亚地区，除印度外，其余六国（巴基斯坦、尼泊尔、不丹、孟加拉、斯里兰卡和马尔代夫）皆为小国，国内政局大多呈现不稳定状态。以孟加拉国为例，执政的人民联盟党与其他反对派联盟的冲突持续存在且日益严重，国内各团体游行示威活动频发，不稳定的政局成为该国发展的重大潜在隐患。类似的国家还有尼泊尔和马尔代夫。尼泊尔目前正处于政治转型期，政局复杂多变，2017年大选之后，尼泊尔中央政府与地方政治势力之间出现明显的撕裂状况，执政党失去地方政府的多数首长职位，动荡不安的政局已经成为制约尼泊尔经济发展的主要障碍。2018年初的马尔代夫政变事件同样表明了该国由于政权交接和党派斗争所导致的国内政局不稳正呈现出愈演愈烈之势。

2. 区域性大国的干扰风险持续存在

印度作为南亚地区唯一的区域性大国，在与该地区其他国家的力量对比上具有压倒性优势，这就决定了印度在该地区的国际事务上具有一定程度的话语权。现实状况也显示印度一直以来都将自己视为南亚地区的“领头羊”，将整个南亚地区划入自己的势力范围，显现出了一定的地区霸权主义倾向。在此大背景下，

伴随着中国“一带一路”倡议在南亚地区的稳步推进，尤其是中国同巴基斯坦、斯里兰卡及马尔代夫在一系列基础设施建设项目上的深度合作，来自印度的戒备与干扰也与日俱增。印度是目前世界主要大国中唯一一个公开明确反对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国家，其直接诱因是中国同巴基斯坦共建的“中巴经济走廊”项目涵盖了印巴争议的“克什米尔地区”，背后的根本原因还是在于印度对于中国通过“一带一路”倡议在南亚地区不断拓展自身影响力而心存芥蒂。2017年11月，尼泊尔因印度方面施压而宣布撕毁与中国企业签订的总额高达25亿美元的最大水电站建设协议，即为此类风险较为典型的案例。未来中国在南亚地区推进“一带一路”倡议的过程中必将继续面临来自印度方面的抵制与干扰。

（四）东南亚地区

东南亚地区主要涵盖东盟十国（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泰国、菲律宾、新加坡、文莱、越南、老挝、缅甸和柬埔寨）外加东帝汶，共十一个国家。多年以来，中国同东南亚各国之间均保持着较为良好的外交与经贸关系，东南亚大部分国家都对“一带一路”倡议表示支持，且所有国家都加入了亚投行，成为其正式会员国。截至2015年底，中国对东南亚地区的直接投资存量占“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总量的54.3%，这表明“一带一路”倡议已经同该地区自身的倡议紧密的结合在一起。但在此背景下，东南亚各国也潜伏着一些不和谐的政治风险因素，使得中国“一带一路”倡议在该地区的进一步推进也将面临着一定的威胁与挑战。具体风险如下：

1. 南海领土主权纠纷仍存在根本性分歧

南海作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对“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进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然而，自20世纪70年代起，围绕中国南海岛礁的主权归属及部分海域的管辖权形成了6国7方的争端局面，近年来，域外大国以南海争端为借口插手南海事务，以谋取政治、经济和战略利益。南海争端成为世界上最复杂的岛屿主权和海洋管辖权争议，被称为“亚洲四大热点”问题之一。尽管当前在中国政府的统一协调下，南海局面趋于平稳，但由于争端的核心问题：部分海域及岛礁的归属管辖权问题并未得到实质性解决，东南亚相关国家在这一问题上同中国仍存在根本性分歧，未来中国在推进“一带一路”倡议的过程中不可忽视这一潜在的政治风险。

2. 部分国家的排华反华心理较为严重

由于历史原因，东南亚部分国家，尤其是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和越南等国国民对华人存在一定的排斥心理，较为典型的案例有发生于1969年的马来西亚暴民排华事件和1998年的印尼反华大屠杀事件。加之近年来，随着中国经济实

力的不断增长和综合国力的不断增强，作为大国的邻国，部分东南亚国家尤其是一些小国逐渐兴起“中国威胁论”的论调，对来自中国的投资也心存戒备。2014年5月，越南就曾发生过打砸抢烧中资企业的暴力反华事件。在此背景下，中国“一带一路”倡议在该地区的推行或将面临一定的挑战。

3. 域外大国的干扰风险长期存在

自2008年美国前总统奥巴马提出重返亚太以来，美国便在军事领域不断增强对东南亚的援助，且计划将海空军的大部分军力调配部署至西太平洋地区，以实现所谓的“亚太再平衡”战略。而在经济领域美国则主动邀请东南亚各国加入由其主导的“跨太平洋协作伙伴关系计划”（TPP，目前美国已经退出），以孤立中国在该地区的经济影响力。尽管目前东南亚各国均与中国保持着良好健康的经贸往来关系，但来自美国的干扰使得中国与东南亚国家之间的外交与经贸关系始终笼罩着一份不确定性，长期来看也会对中国“一带一路”倡议在东南亚地区的实施造成困扰。

（五）中东与北非地区

中东与北非地区一直以来都是全球最为动荡不安的地区之一。宗教冲突、民族矛盾、大国博弈使得中东局势长期错综复杂，成为国际政治的火药桶。而中东与北非地区还是中国推进“一带一路”倡议路线图中不可或缺的关键环节，在此背景之下，“一带一路”倡议在该地区也将面临着众多的政治风险，且随着国际局势的不断变化，这种政治风险的形式也变得越来越多样化与复杂化，既有传统安全领域的风险，也有新型的法律政策及宗教文化等领域的风险。具体表现如下：

1. 部分国家国内政局动荡乃至爆发战争的风险高企

政局动荡和战争风险是中国“一带一路”倡议在中东与北非地区推行过程中所面临的最主要的政治风险。这类风险在中东与北非地区的表现形式具有不可抗性与突发性，且一旦发生具有巨大的破坏性。中东与北非地区地处亚欧非三大洲的交汇处，战略位置极其重要，为争夺宝贵的淡水资源和石油资源，以及各民族之间宗教文化上的差异，加之西方各大国长期以来的介入，导致该地区常年战争不断。较为典型的案例中既有长达几十年纷争的巴以冲突，也有近年来兴起的阿拉伯之春革命浪潮中的埃及内乱，利比亚内战以及目前仍处于战争状态中的叙利亚乱局。战争使得这些国家处在持续动荡与不稳定之中，国内社会秩序急剧恶化，企业无法正常运营，甚至会造成巨大的人员伤亡与财产损失。以利比亚为例，该国并非中国重要的贸易伙伴，更不是中国重要的投资目的地，即便如此，2013年利比亚爆发内战后中国企业在该国投资损失惨重。中国动用各种手段紧急撤侨，直接花费超过3亿人民币；在利比亚战火中损失的中方企业财产高达15亿人民

币；中国在利比亚工程承包合同额 188 亿美元全部丧失，最终损失可能高达 200 亿美元。卡扎菲倒台之后，中国政府试图与掌权的“利比亚国家过渡委员会”商讨恢复商业合同及相关索赔事宜，但至今未果。由于动荡与战争背后的根源短时间内难以消除，未来类似的风险不仅会出现在伊拉克、叙利亚、利比亚、也门、巴勒斯坦等目前正处于战乱状态中的国家，也有可能出现在伊朗、土耳其、沙特、阿联酋、埃及等暂时尚属和平的国家，这将对我国“一带一路”倡议在该地区的推进带来极大的考验。

2. 法律政策及宗教文化风险较高

中东与北非地区大多数国家政治发育程度较低，法治化建设不完善，甚至很多国家并没有成文的法律法规条文，而是依赖于《古兰经》进行社会治理。这就直接导致一些国家的相关产业政策缺乏透明度与连续性，商业信用较低。在这方面较为普遍的一种表现形式为政府单方面宣布修改乃至终止已经生效的商业合同，譬如将一些大型的外资控股油气及矿产开采项目变更为合资项目，并由本国政府控股。最为典型的案例是 2012 年中石油在开发伊朗南帕尔斯油气田项目时，因伊朗政府的介入与干涉而被迫中断项目开发，并撤回全部中方人员。

此外，中东与北非地区是全世界穆斯林最为聚集的区域，伊斯兰教盛行，教义信仰深入当地居民生活的方方面面，深刻影响着当地的社会文化形态。以沙特为例，沙特的社会经济活动受到相关伊斯兰教法的约束，在沙特开办企业要严格遵循伊斯兰教法，譬如禁止从事贩卖酒精、烟草、猪肉，禁止高利贷和获取利息。伊斯兰教规中最重要的是礼拜、斋戒和朝觐等活动，虔诚的阿拉伯人即使在工作或洽谈业务中途也会放下手头的工作去做礼拜。此外，部分阿拉伯人时间观念较差，经常迟到甚至爽约。同世界其他地方相比，阿拉伯人不太注重商业合同的严肃性，合同的订立与履行往往较为随意，常常以神的旨意来终止合同。类似宗教文化上的差异也将会成为中国“一带一路”倡议在该地区推行的潜在政治风险。

（六）中东欧地区

中东欧地区是“一带一路”沿线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高的区域，政治格局也相对较为稳定。其中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斯洛文尼亚、克罗地亚、罗马尼亚、保加利亚、爱沙尼亚、立陶宛、拉脱维亚属于发达经济体，社会经济发展健康有序；塞尔维亚、马其顿、黑山、波黑、阿尔巴尼亚、白俄罗斯等国属于转型经济体，商业环境也呈现良好态势。但因历史原因而横亘在各国之间（尤其是东欧国家之间）的边界问题，北约与欧盟的政策偏向及乌克兰危机依然会成为中国在该地区实施“一带一路”倡议需要规避的政治风险。

1. 因边界等问题而导致的国际冲突风险不容忽视

中东欧各国之间存在着很多历史遗留的外部纠纷，譬如亚美尼亚与阿塞拜疆之间悬而未决的“纳卡问题”导致两国外交纷争不断。随着两国经济发展水平逐渐失衡，占据上风的阿塞拜疆可能会利用战争来强行收回纳卡地区，这是一场可以预期的潜在战争威胁。此外，克罗地亚与塞尔维亚之间关于“科索沃问题”存在的严重分歧导致两国外交局势持续陷入紧张状态，也将是一个潜在的政治风险。诸如类似的历史遗留问题所引发的国家间紧张态势将是中国在中东欧地区推行“一带一路”倡议时必须面对的重要挑战，这种潜在的国际冲突风险有可能会进一步演化成投资政策变动乃至企业经营被迫中断的导火线。

2. 北约与欧盟对华政策干扰的风险值得关注

中东欧地区的国家当中，有部分国家属于北约成员国（波兰、捷克、斯洛伐克、斯洛文尼亚、立陶宛、拉脱维亚、爱沙尼亚、克罗地亚、保加利亚、罗马尼亚、阿尔巴尼亚、黑山），有部分国家属于欧盟成员国（波兰、捷克、匈牙利、斯洛伐克、斯洛文尼亚、塞浦路斯、马耳他、拉脱维亚、立陶宛、爱沙尼亚、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克罗地亚），其余国家都在争取加入这两个国际组织。所以北约与欧盟对中国的政策偏好将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中东欧国家对“一带一路”倡议的态度，譬如欧盟对华贸易政策、投资政策在其成员国范围内具有一致性和协调性原则。这种来自外部的政策干扰风险值得关注。

3. 乌克兰危机深层次隐患依旧存在

2014年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地区导致俄乌双方乃至俄罗斯与整个西方世界关系持续紧张，并引发乌克兰国内各政治势力之间的激烈冲突，乌克兰危机由此爆发。虽然目前乌克兰国内各利益攸关方已签署相关停火协议，但这场危机背后所隐藏的乌克兰国内亲俄与亲西方势力之间深层次的矛盾并未解除。加之俄罗斯与西方大国之间在乌克兰问题上不间断的相互博弈，未来乌克兰国内仍有可能产生分裂和动乱的局面。这将对乌克兰乃至整个东欧地区的稳定与发展产生负面作用，继而影响中国“一带一路”倡议在该地区的推行。

四、结论

通过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政治风险的探究与分析，我们发现相较于欧美等西方发达国家，“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政治风险普遍偏高，且具有一定的原发性（譬如中东地区，宗教、民族等矛盾冲突延续了数千年）。这就要求中国在推进“一带一路”倡议的过程中学会识别乃至预测政治风险，并做到趋利避害。相信在“一带一路”倡议成功推进之后，自近代以来海权对抗陆权

专题研究

博弈局面将会转变为海陆和合的新局面。同时，以“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两大经济圈为翅膀，以亚欧非三大洲的融合发展为脊柱，“一带一路”倡议将会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乃至整个亚欧大陆的再次崛起提供强大动能。